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中国新文学大系

文學論爭集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國新文大學系

編主璧家趙書



集 二 第

一九三五，八，三十付排

一九三五，十，十五初版

導言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元十二洋大售部大十書全

文集論爭

鄭振鐸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導

言

般雜誌用文言寫作的提倡『德智體』三育的青年讀物。

後來改成了新青年，也還是文言文為主體的，雖然在思想和主張上有了一個激烈的變異。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在一九一七年發表。這誠是一個『發難』的信號。可是也祇是一種『改良主義』的主張而已。他所謂文學改良，祇『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他所主張的祇是淺近平易的文字，祇是『不避俗字俗語』的文字。但他『以施耐菴，曹雪芹，吳趸人爲文學正宗』，且以爲『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不過他還持着商榷的態度，還不敢斷然的主張着非寫作白話文不可。

陳獨秀繼之而作文學革命論，主張便鮮明確定得多了。他以『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爲『十八妖魔輩』，而斷然的加以排斥。『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他高張着『文學革命軍』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他答胡適的信道：「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爲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

他是這樣的有着烈火般的熱誠，在做着打先鋒的事業。他是不動搖，不退縮，也不容別人的動搖與退縮的！

革命事業乃在這樣的激頭激尾的不妥協的態度裏告了成功。

他們的影響漸漸的大了。陳獨秀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爲文科學長。胡適剛由美國回來，也在北大教書。同事的教授們還有錢玄同，沈尹默，劉復，李大釗，周作人，魯迅等和他們互相呼應，互相討論。北大的學生傅斯年等也起而和之。

他們的主張因了互相討論的結果，更是確定鮮明了，且也進步了不少。錢玄同說：「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爲美文，此爲文章之進化。實今後言文一致之起點。此等白話文章，其價值遠在所謂『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與陳獨秀書）劉半儂的『我之文學改良觀』，也是一篇有力的文章。錢玄同不大贊成舊小說，尤惡舊劇，劉半儂也以爲『余贊成小說爲文學之大主腦，而不認今日流行之紅男綠女之小說爲文學。』這都是一種具有很大的進步的言論。他們已經不單注重到形式的，且也注重到內容的問題了。

一九一八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一號的新青年，便實行他們自己的主張，完全用白話做文章。在這一卷裏，胡適有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

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中國若想做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這一篇可算是他們討論了兩年的一篇總結論，也可以說是一篇文學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二

當他們在初期的二三年間討論着文學革命的問題的時候，同情者們固然是一天天的增多了，反對的人却也不少。不過都不是很有力量的。當時有一班類乎附和的人們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不少的言論，卻往往是趨於凡庸的折衷論。曾毅說道：『昔之人欲售其主張，恆藉其選本以樹之鵠，非如現在坊間選本之無甚深義也。僕以爲足下既張革命之軍，突使一般青年觀之，茫然莫得其標準之所在。則莫妙於取古今忙人之詩文，與吾宗旨稍近者，詩如李陵陶潛及古詩二十九首之類，文如黃太冲君王守仁祭陸旅文之類，選爲課本，使人知有宗向。由是以趨於改進，似更易爲功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方宗嶽的見解，尤爲可笑：

『由是觀之。鄙意對於胡先生之說。既不敢取絕對的服從，則有折衷之論在乎。曰有。卽分授之說是也。對於小學生。則授以普通之應用文字。文理與白話二者可精酌而並取。中等以上之學者。則取純一文理，而示以深遠精奧之所在。如此則庶幾無人不識應用之文字。而所謂深奧文理者，亦自有一般專門之學者探討。而使古來本有之經理藝術不因是而火其傳也。胡先生其首肯乎。』

余元濟說道：

『吾人既認白話文學爲將來中國文學之正宗。則言改良之術。不可不依此趨向而行。然使今日卽以白話爲各種文字。以予觀之。恐矯枉過正。反貽人之唾棄。急進反緩。不如姑緩其行。歷代文字。雖以互相摹倣爲能。然比較觀之。其由簡入繁。由深入淺。由隱入顯之跡。亦頗可尋。秦漢文學。異於三代文學。

魏晉文學。異於秦漢文學。隋唐文學。異於魏晉文學。宋以後文學。異於隋唐文學。苟無時時復古一弊。則順日進之勢。言文相距日近。國民文學必發達而無疑。故吾人今日一面急宜改良道德學術。一面順此日進之勢。作極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語。而將來合於國語可操預券。（白話小說詩曲自是急務）他們都是『改良派』，『恐矯枉過正，反貽人之唾棄。急進反緩。不如姑緩其行』的人物。這些折衷派的言論，實最足以阻礙文學革命運動的發展。

好在陳獨秀們是始終抱着不退讓，不妥協的態度的，對於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信守着，『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遂不至上了折衷派的大當。

一九一八年的十二月，陳獨秀們又辦了一個白話文的週刊，名為每週評論。緊接着，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辦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名為新潮。他們都和新青年相應和着。

他們的勢力是一天天的更大，更充實；他們的影響是一天天的更深入於內地，他們的主張是一天天的更為無數的青年們所信從，所執持着了。

白話文的勢力更擴充到日報裏去。不久的時候，北京的國民公報，藍公武主持着的一個研究系的機關報，也起而響應之。以後，同系的一個日報，即在上海的時事新報，也便出來擁護他們的主張。

二二

這面『文學革命』的大旗的豎立是完全的出於舊文人們的意料之外的。他們始而漠然若無睹；繼而鄙夷若不屑與辯，終而不能不憤怒而咒詛着了。

在新青年的四卷三號上同時刊出了王敬軒的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和劉復的復王敬軒書。王敬軒原是亡是公烏有先生一流人物。托為王敬軒寫的那一封信乃是新青年社的同人錢玄同的手筆。

爲什麼他們要演這一齣『苦肉計』呢？

從他們打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以來，始終不曾遇到過一個有力的敵人。他們『目桐城爲謬種，選學爲妖孽』。而所謂『桐城，選學』也者却始終置之不理。因之，有許多見解他們便不能發揮盡致。舊文人們的反抗言論既然竟是寂寂無聞，他們便好像是儘在空中揮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

所謂王敬軒的那一封信，便是要把舊文人們的許多見解歸納在一起，而給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擊的。可是，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運動也便來了。

古文家的林紆來放反對的第一炮。他寫了一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重要的主張是：『卽謂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實則此種教法，萬無能成之理，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辯之者。』

其實不必等到『百年』，林紆他自己已迫不及待的親自出馬來『正其非』了。他給了一封書給蔡元培：

『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嗚噉。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孔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卽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商周之刳豆爲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鴉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股授我者以中原語言，仍令我爲鴉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

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爲客，以白話爲主不可也！……

「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個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確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

他的論點是很錯亂的。蔡元培的覆信，辭正義嚴，分割事理，至爲明白。他是沒有話可以反駁的。

但他衛道「正」文的熱情，又在另一個方向找到出路了。他連續的在報紙上寫了兩篇小說：一篇是荆生，一篇是妖夢，兩篇的意思很相同；不過一望之俠士，一托之鬼神罷了；而他希望有一種「外力」來制裁，來壓伏這個新的運動却是兩篇一致的精神。諷罵之不已，且繼之以詛咒了！

同時，北京大學裏也另有一派守舊的學生們，則出版一個月刊國故，作擁護古典文學的運動。

當時是安福系當權執政。謠言異常的多。時常有人在散布着有政治勢力來干涉北京大學的話，並不時的有陳胡被驅逐出京之說。也許那謠言竟有實現的可能，假如不是「五四運動」的發生。

林紆的熱烈的反攻新青年人們乃是一九一九的二三月間的事。而過了幾月，便是「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安福系不久便塌了台，自然更沒有力量來對於新文學運動實施壓迫了。

「五四」運動是跟着外交的失敗而來的學生的愛國運動，而其實也便是這幾年來革新運動所蘊積的火山的一個總爆發。這一塊石片拋在靜水裏，立刻便波及全國。上海先來了一個猛烈的響應，總罷市，罷學，以爲北京學生的應援。被認爲攻擊目標的曹汝霖輩遂竟被罷免了，各地的學生運動，自此奠定了基礎。說是政治運動，愛國運動，其實也便是文化運動。

白話文運動的勢力在這一年裏突飛的發展着。反對者的口完全的沈寂下去了。「有人估計，這一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文學研究會在這一年的冬天成立於北京。小說月報也在這時候改由沈雁冰編輯，完全把內容改革了過來，成爲新文學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機關雜誌。新文學運動

在這個時候方才和一般的革新運動分離了開來，而自有其更精深的進展與活躍。

文學旬刊，文學研究會的一個機關刊物，也附在時事新報裏開始發行。在第二期的新文學運動裏盡了很大的力。

日本留學生郭沫若，郁達夫等，也組織了一個文藝團體，名爲創造社，刊行創造季刊。

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新青年社的白話文運動發展到最高的頂點。以後，這個運動便轉變了方向，成爲純粹的新文學運動。同時，新青年社便也轉變而成爲一個急進的政治的集團。

而初期的爲白話文運動而爭鬥的勇士們，像錢玄同們，便都也轉向的轉向，沉默的沉默了。

祇有魯迅，周作人還是不斷的努力着，成爲新文壇的雙柱。他們刊行着語絲和莽原，組織未名社，在新文學運動裏繼續的盡着力，且更勇猛的和一切反動的勢力在爭鬪着。

一方面我們感覺得新勇士們的那末容易衰老，像大部分的新青年的社員們，同時卻也見到有不老的不妥協不退卻的勇士們在做青年們的指導者。

四

文學研究會活躍的時期的開始是一九二〇年的春天。這時候，小說月報，一個已經有了十幾年的歷史的文學刊物，在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們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幾乎變成了另一種全新的面目。和小說月報相呼應着的有附刊在上海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這旬刊由鄭振鐸主編，後來刊行到四百餘期方才停刊。這兩個刊物都是鼓吹着爲人生的藝術，標示着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他們反抗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抗以文學爲遊戲的鴛鴦蝴蝶派的『海派』文人們。他們是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的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革命的旗幟的。他們不僅推翻傳統的惡習，也力拯青年們於流俗的陷溺與沈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純正的文學大道。

他們排斥舊詩舊詞，他們打倒鴛鴦蝴蝶派的代表『禮拜六』派的文士們。

他們翻譯俄國，法國及北歐的名著，他們介紹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安特列夫，易卜生以及莫泊桑等人的作品。

他們提倡血與淚的文學，主張文人們必須和時代的呼號相應答，必須敏感着苦難的社會而爲之寫作。文人們不是住在象牙塔裏面的，他們乃是人世間的『人物』，更較一般人深切的感到國家社會的苦痛與災難的。關於這一類的言論，他們在文學旬刊以及後來的文學週報（即旬刊的後身）上發表得最多。可惜這幾種初期的刊物，經過了一二八的戰役，幾已散失無遺，很難得在這裏把他們搜集起來。

沈雁冰在什麼是文學裏把他們的主張說明了一部分：

『名士派重疏狂脫略，愈隨便愈見得他的名士風流；他們更蔑視寫真，譬如見人家做一篇詠陶然亭的詩，自己便以詩和之，名勝古蹟，如蘇小小墓，岳武穆墓，雖未至其地，也喜歡空浮的寫幾句，如比干之墳，實在並沒有的，而偏要胡說，這真所謂有其文，不必有其事了（這兩句便是他們不注重真的供詞。）所以他們詩文中所引用的禽鳥草木之名，更加可以只顧行文之便，不必核實了。新文學的寫實主義，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譬如講余山必須至少去過一次，必不能放無的之矢。』

『名士派毫不注意文學於社會的價值，他們的作品，重個人而不重社會；所以拿消遣來做目的，假文學罵人，假文學媚人，發自己的牢騷。新文學的作品，大都是社會的；即使有抒寫個人情感的作品，那一定是全人類共有的真情感的一部份，一定能和人共鳴的，決不像名士派之一味無病呻吟可比。新文學作品重在讀者所愛的影響，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將個人意見顯出自己文才。新文學中也有主張表現個性，但和名士派的絕對不同，名士派只是些假情感或是無病呻吟，新文學是普遍的真情感，和社會同情不悖的。新文學和名士派中還有很不同的地方，新文學是積極的，名士派是消極的。新文學描寫社會黑暗，用分析

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詩中多抒個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讀後，得社會的同情，安慰和煩悶。名士派呢，面上看來，確似達觀，把人間一切事務，都看得無足重輕，其實這種達觀不過是懶的結晶而已。」

所謂「描寫社會黑暗，用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便正是寫實主義者的描寫的手法。沈雁冰又有一篇大轉變時期時來呢，對於文學的「積極性」尤加以發揮：

「所以近來論壇上對於那些吟風弄月的，「醉罷美呀」的所謂唯美文學的攻擊，是物腐虫生的自然的趨勢。這種攻擊的論調，並不單單是消極的；他們有他們的積極的主張：提倡激厲民氣的文藝。

「我自然不贊成托爾斯泰所主張的極端的「人生的藝術」，但是我們決然反對那些全然脫離人生的而且濫調的中國式的唯美的文學作品。我們相信文學不僅是供給煩悶的人們去解悶，逃避現實的人們去陶醉；文學是有激厲人心的積極性的。尤其在我們這時代，我們希望文學能夠擔當喚醒民衆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我們希望國內的文藝的青年，再不要閉了眼睛冥想他們夢中的七寶樓台，而忘記了自身實在是住在豬圈裏，我們尤其決然反對青年們閉了眼睛忘記自己身上帶着鐵鎖，而又肆意譏笑別的努力想脫除鐵鎖的人們，阿Q式的「精神上勝利」的方法是可恥的！」

「巴比塞說：「和現實人生脫離關係的懸空的文學，現在已經成爲死的東西；現代的活文學一定是附着於現實人生的，以促進以前的人生爲目的了。」國內文藝的青年呀，我請你們再三的思量巴比塞這句話！我希望從此以後就是國內文壇的大轉變時期。」

沈雁冰又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及社會背景與創作把那主張更闡發得明白。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這是他們的共同的見解。「我覺得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是於人類有關係的文學，在被迫害的國裏更應該注意這社會背景」。(社會背景與創作)「注意社會問題，愛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這便是他們的宣言。

他們曾在小說月報上出過俄國文學博覽及被壓迫民族文學專號(?)。並且他們在創作上也曾多少的實現過他們的主張。

不久，北平的一部分文學研究會會員也在晨報上附刊一種文學旬刊，廣州的一部分文學研究會會員也出版一種廣州文學旬刊。葉紹鈞，俞平伯，朱自清等又在上海創辦詩雜誌及我們。但他們的主張便沒有那末鮮明了。

和文學研究會立於反對地位的是創造社。創造社在一九二〇年的五月，刊行創造季刊，後又刊行創造週刊，又在上海中華日報附刊創造日。

創造社所樹立的是浪漫主義的旗幟；而其批評主張，且純然是持着唯美派的一種見解的。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裏說道：

「所謂藝術的藝術派便是這般。他們以為文學自有牠內在的意義，不能長把牠打在功利主義的算盤裏，牠的對象不論是美的追求，或是極端的享樂，我們專誠去追從牠，總不是叫我們後悔無益之事……」

「藝術派的主張不必皆對，然而至少總有一部分的真埋。不是對於藝術有興趣的人，決不能理解爲什麼一個畫家肯在酷熱嚴寒裏工作，爲什麼一個詩人肯廢寢忘餐去冥想。我們對於藝術派不能理解，也許與一般對於藝術沒有興趣的人不能理解藝術家同是一轍。」

「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的全 *Perfection* 與美 *Beauty* 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種美的文學，縱或牠沒有什麼可以教我們，而牠所給我們的美的快感與慰安，這些美的快感與安慰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

「而且文學也不是對於我們沒有一點積極的利益的。我們的時代對於我們的智與意的作用賦稅太重了。我們的生活已經到了乾燥的盡處。我們渴望着有美的文學來培養我們的優美的感情，把我們的生活

洗刷了。文學是我們的精神生活的糧食，我們由文學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歡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躍！

『我們要追求文學的全！我們要實現文學的美！』

他是反對文學的『功利主義』的。他以為文學對於我們的『一點積極的利益的』乃是由於這種『精神生活的糧食』使我們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歡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躍』。

但浪漫主義者究竟熱情的，他們也往往便是舊社會的反抗者。在郭沫若的詩集女神裏，這種反抗的精神是充分的表現着的。他有一篇我們的文學新運動：

『中國的政治生涯幾乎到了破產的地位。野獸般的武人之專橫，沒廉恥的政客之蠢動，貪婪的外來資本家之壓迫，把我們中華民族的血淚排抑成黃河揚子江一樣的赤流。

『我們暴露於戰亂的慘禍之下，我們受着資本主義這條毒龍的巨爪的蹂弄。我們渴望着和平，我們景慕着理想，我們喘求着生命之泉。

『但是，讓自然做我們的先生罷！在霜雪的嚴威之下新的生命醱酵，一切草木，一切飛潛蠕匍，不久便將齊唱凱旋之歌，歡迎陽春之歸至。

『更讓歷史做我們的先生罷！凡受着物質的苦厄之民族必見惠於精神的富裕，產生但丁的意大利，產生歌德許雷的日耳曼，在當時是決未曾膺受物質的惠恩。

『所以我們浩嘆，我們懊悔，但是我們決不悲觀，決不失望！我們的眼淚會成新生命之流泉，我們的痛苦會成分娩時之產痛，我們的確信是如此。

『我們現在於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種新的運動，我們於文學事業中也正是不能滿足於現狀，要打破從來因襲的樣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現。』

這卻是『血與淚的文學』的同羣了。成仿吾在一九二四年也寫了一篇藝術之社會的意義，已不復囿於『唯美』

的主張；雖然也還是說道：「既是真的藝術，必有牠的社會的價值；牠至少有給我們的美感」。但緊接着便自白道：「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社會的一個分子，我們自己知道我們在熱愛人類——絕不論他的善惡妍醜。我們以前是不是把人類社會忘記了，可不必說，我們以後只當更用了十二分的意識把我們的熱愛表白一番」。道便是創造社後來轉變為革命文學的集團的開始。

在這個時候，他們的主張和文學研究會的主張已是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了。

五

文學研究會對復古派和鴛鴦蝴蝶派攻擊得最厲害。當然也召致了他們的激烈的反攻。

復古派在南京，受了胡先驥，梅光迪們的影響，彷彿自有一個小天地；自在地在寫着『金陵王氣脂沈銷』一類的無病呻吟的詩。胡先驥們原是最反對新文學運動的。他對胡適的嘗試集曾有極厲害的攻擊。又寫了一篇『中國文學改良論』。梅光迪也寫了一篇評提倡新文化者。他們的同道吳宓，也寫着論新文化運動一文。他們當時都在南京的東南大學教書。彷彿是要和北京大學形成對抗的局勢。林琴南們對於新文學的攻擊，是純然的出於衛道的熱忱，是站在傳統的立場上來說話的。但胡梅輩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場來說話了。他們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藝理論來做護身符。聲勢當然和林琴南，張厚載們有些不同。但終於『時勢已非』，他們是來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學運動已成了燎原之勢，決非他們的書生的微力所能撼動其萬一的了。

然而在南京的青年們竟也有一小部分是信從着他們的主張。

他們在一個刊物上，刊出一個『詩學專號』所載的幾全是舊詩。文學旬刊便給他們以極嚴正的攻擊。這招致了好幾個月的關於詩的論爭。這場論爭的結果便是撲滅了許多想做遺少的青年人們的『名士風流』的幻想。同時也更確切的建立了關於新詩的理論。